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 与比较文字学论集

王元鹿 著

在对南方民族文字学的研究中，历史古文字与近现代还在使用的古文字的研究不仅有极大的价值，而且这两者之间往往是在内容上紧密联系而在发展中有着传承或传播关系的。而且，我国南方民族的历史古文字与现行古文字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在性质、族属、发生时代、所表意义以及它们与其他种类民族古文字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从而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系列的谜团。因此，重视并加强对我国历史古文字的研究，是我们民族古文字研究者的任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 与比较文字学论集

王元鹿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王元鹿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ISBN 978-7-5325-6440-8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①H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202 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

王元鹿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3 字数 450,000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325-6440-8

H·74 定价:5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第一篇 文字发生与发展

北美印第安文字对文字源泉研究的启发意义·····	3
汉字发生研究目的论·····	9
汉字发生研究材料论·····	16
汉字发生研究方法论·····	23
十九世纪末以前汉字发生研究的历史回顾·····	29
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汉字发生研究的历史回顾·····	37
关于民族文字发展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52
汉字异体流变说·····	57

第二篇 文字性质与构造

表词—意音文字记录语言方式的比较 ——兼论汉字的某些特殊性格·····	71
关于我国民族古文字性质的同义比较：意义与任务·····	84
中国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一些瓶颈·····	91
关于我国南方民族历史古文字的一些谜团·····	98
我国含表意成分的民族古文字的定义及其学术研究上的意义·····	104

第三篇 文字关系与传播

关于文字传播的同义比较的意义与任务·····	113
东巴文与哥巴文、玛丽玛莎文、达巴文的关系之初步研究·····	118

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字不同源流说·····	123
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流播中的发展 ——兼论这一研究对文字史与普通文字学研究的意义·····	129

第四篇 民族文字比较研究

纳西东巴文与汉形声字比较研究·····	141
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古文字假借现象的比较及其在文字史上的认识 价值·····	148
纳西东巴文字黑色字素论·····	152
东巴文“大”字字形演变蹊径对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160
关于纳西东巴文“天”字的若干文字学思考·····	165
玛丽玛莎文两次调查所得单字的比较及其文字学意义·····	169
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	172
尔苏沙巴文的特征及其在比较文字学上的认识价值·····	185
“坡芽歌书”的性质及其在文字学领域中的认识价值·····	192
水文在文字学研究中的认识价值与研究方法·····	199
水文方位字研究及其对普通文字学研究的启发 ——兼论水文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	204
水文中的数目字与干支字研究·····	208
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库建立的若干设想与难题及其对策·····	211

第五篇 文字研究与文化

说“方”·····	217
“心”字探源·····	222
东巴文计数习俗中所见原始思维·····	239
猪与古代文化·····	245
汉字中的“猪”·····	256

洪水滔天话远古——说“昔”	257
“白”与殷人的白色崇拜	258
古人是如何“休闲”的	259
“龙”，你到底是什么？	261
说“犬”侃“狗”	263

第六篇 书评与序跋

《纳西象形文字谱》评介	269
读《汉字文化学简论》	276
洛克《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简评	277
评黄思贤《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 ——兼论东巴文研究中用字研究的意义	286
郑飞洲《纳西东巴文字字素研究》序	292
周斌《东巴文异体字研究》序	294
高慧宜《傣僳族竹书文字研究》序	297
黄思贤《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以〈崇搬图〉和〈古事记〉 为例》序	300
刘悦《纳西东巴文异体字关系论》序	302
俞允海、潘国英《中外语言学的对比与研究》序	305
《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后记	307
《普通文字学概论》后记	309
《比较文字学》后记	311
《学生常用古代汉语词典》序	312

第一篇 文字发生与发展

北美印第安文字对文字源泉 研究的启发意义

一、引 论

北美洲某些地方与某些部落的印第安人，使用相当原始的文字来表词达义。虽然不同地方和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对文字的写法、用法不尽一致，但从性质来看，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文字，一般均可归入文字史上的早期文字（或称初期文字、原始文字或图画文字）之列。

历来的文字学研究者，往往对中南美洲的马亚、阿兹忒克等民族的古文字的破译与研究投入了极多的力量，而对于距今时代较近但性质更为原始的北美印第安早期文字却较少注意。然而，倘若我们站在文字发生史和文字发展史的角度上，又带着比较文字学的目光去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字，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对于早期文字的发生、早期文字的性质和早期文字向字词—意音文字的过渡等一系列文字学上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我国和世界的文字学者，对于文字的发生尤其是文字的渊源物和文字的发生过程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未有定论。本文拟从北美印第安文字的一些例证出发，就有关文字渊源和文字发生过程中的符号的地位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北美印第安文字的原始性格，以这种文字为出发点去讨论文字起源，必定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发。

二、对于早期文字来源的种种看法

关于“早期文字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尽管文字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但时至今日，否定图画为文字来源（至少是来源之一）的，几乎是没有了。然而，各家看法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一些学者认为图画是文字的唯一源泉，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除图画文字外还有其他的源泉。

持文字仅来自图画的“一元论”说者，当以梁东汉先生为代表。梁先

生在他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一书中，主张图画是文字的唯一源泉，余者皆非。^①除梁先生外，还有不少学者亦主此说，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唐兰先生似乎是从一元论转向二元论的。他在30年代所写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持“文字的起源是图画”^②的观点。然而到他40年代所写的《中国文字学》中，他却指出：“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③

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为指事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④看来，郭先生的二元论似与唐先生有所区别。不过从郭先生上面的话推测，很可能郭、唐二氏的观点在实质上十分相近，这是由于郭氏既然主张指事系统为文字的一源且比象形系统产生更早，则文字必有图画之外的其他源泉，因为按常理来说，以一群指事字构成的一个原始文字系统，不大可能直接来自图画。

伊斯特林先生亦主二元论。他认为“第二个（在原始艺术之外）形成原始文字的源泉是各种非书写的、‘实物的’传达信息的方法”。^⑤伊氏还指出这些“方法”包括某些符号如假定符号和记忆符号。^⑥

汪宁生先生提出“文字是由三类记事方法（即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笔者按）引导出来的，而不是仅仅起源于图画”。^⑦事实上，汪先生的三元论与伊氏的观点十分相似，因为伊氏所论及的“方法”中亦包括汪氏所论的“物件记事”。显然，汪先生的三元论亦认为图画并非文字的唯一源泉。

从上面胪列的各家说法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位主张二元论或三元论的学者，都提到了符号是文字的源泉之一。因此，如若我们可以判定符号确系文字的一个源泉，那么一元论便不攻自破了。以下，我们将对印第安文字中的符号的存在及其来源作一些讨论。在此项说明的是：广义地说，文字即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我们在下文中将提及的符号，一类是狭义上的，是指文字形成之前或进入文字之前人们用以记事的符号，

①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26-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

②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71-83页，齐鲁书社，1981年。

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④ 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奴隶制时代》，25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⑤ V. A. Istrin：《文字的发展》（杜松寿译），6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年。

⑥ V. A. Istrin：《文字的发展》（杜松寿译），64-7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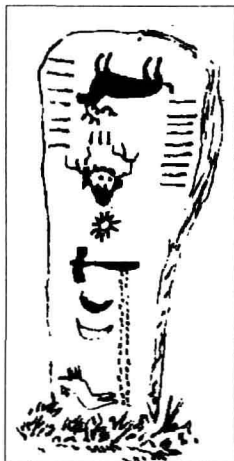
⑦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38页，1981年第1期。

如路标、结绳、非文字的刻划符号等等。另一类我们将要提到的符号，则是指文字中存在的指示性符号、抽象符号、连结符号等，这是从作为文字的意义出发的符号。依据以上说明，读者将不难辨别下文中各处出现的“符号”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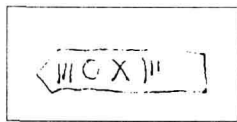
三、符号是文字的来源之一

如上文所述及，由于北美印第安文字是一种带有相当强的原始性格的文字，所以从一些印第安文字的构成中，可以发现关于早期文字来源的蛛丝马迹。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印第安文字中有许多指事字。如著名的印第安酋长华布其的墓志铭（见[图一]）^①中，有一些实线与虚线。尽管各家对这一墓志铭的意义的考释不尽相同，用三条实线记录的“三”、七条实线记录的“七”和用九条实线记录的“九”，以及用两条垂直的长虚线记录的“二”，显然是表示“七”、“九”和“二”的四个指事字。又如，印第安人用×表示“第四”，用×表示“第一次伤敌”，^②这二字亦当为指事字。至少后一字很难被看作是图画进入文字之后的进一步抽象。支持这一想法的是一些可以被视为早期文字的契刻。如[图二] ^③所示为我国傣族的传统木刻。据李家瑞先生释，它所记录的语言为：“来的三个人，月亮圆时和我们会面了，现在送上大、中、小三包土物，分别送给大、中、小三位领导。”^④这些文字，除○（月亮圆）可视作早期象形字外，×，**|||**和**|||**均为指事字。很难设想要傣族更早期的契刻中这三个






图一







图二

- ① 采自 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王荣宅校），6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 ② George Fronval and Daniel Dubois: *Indian Signals and Sign Language*, PP. 68-69, Wings Books, 1985.
- ③ 采自 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王荣宅校），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 ④ 李家瑞：《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载《文物》，12 页，1962 年第 1 期。

字曾用象形来写。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印第安文字中还有许多以抽象符号为构件的文字。如“听”作，“看”作，“说”作等等。^①发人深思的是，“看”、“说”二字与北美平原印第安手势语极为相似。“看”的手势语为：右手置于右目下方，食指与中指指向前方；“说”的手势语为：右掌置于下巴下方，右手五指向前上方伸出。^②可见，与其把这些符号的来源说成图画，还不如把它们视为手势语的书面符号记录。

无独有偶，带有相当成份的原始文字特征的纳西东巴文字中的一些字，同印第安文字一样，含有不少抽象符号。如“听”作，“说”作，与印第安文字相比，真可谓如出一辙。看来，我们也同样很难设想纳西东巴文字中的这些字中的抽象符号构件来自图画。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印第安文字中找到许多连结符号。如“联盟”作，字的下方连结二人者当是一个表示“联合”、“连结”之类义的连结符号；又如“谈话”作，在象征谈话双方的二兽之间，以一直线系连，表“对话”、“沟通”之类意义。而[图三]^③为著名的北美印第安文字样品——一封印第安人要求美国总统允许他们迁到三湖地区去的信，如果我们仔细对它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代表7个部落的7个动物的头部和心脏，都被一条条曲线连结起来了。又如印第安著名的结珠——四族联盟结珠（见[图四]），^④可被视为一个原始文字图形，两侧的四个正方形象征四个部族，中间的“心”形当象征他们的一致。这一图形除“心”外，明显地均由符号构成，四正方形为抽象符号，而连结四正方形与“心”的四条线是连结符号。显而易见，这类连结符号在印第安文字中的存在，比抽象符号的存在更加雄辩地证实了符号是原始文字的来源之一。因为，如果说，那些文字中的抽象符号可以被假定为图画在进入文字之后的抽象化的结果，也就是这些符号在最初的印第安文字中并不存在，那么，我们仍无法设想那些意义本来十分空灵的联系符号也是来自象形符号或早期象形字，因为如上述表示“连结”、“沟通”

① George Fronval and Daniel Dubois: *Indian Signals and Sign Language*, P. 68, Wings Books, 1985.

② 采自 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王荣宅校),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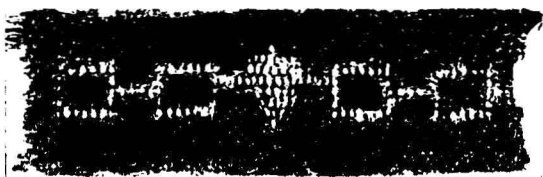
③ 采自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18页,武汉古籍书店影印,1987年。

④ George Fronval and Daniel Dubois: *Indian Signals and Sign Language*, Wings Books, 1985.

之类意义的一些线条，它们所表的词义或词素意义一直就是“连结”、“沟通”，我们根本无法设想它们有可能从某个象形符号进一步抽象化或简化而来。



图三



图四

通过以上的举例与说明，我们可以相信，文字前的一些符号，可能在印第安文字形成时，立即进入文字。这些符号有可能独立地成为指事字，有可能与其他符号合成复合指事字，有可能与一些象形符号或象形字合成在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的指事字（如汉字中的“刃”是在象形字上加一指事符号）。可见，文字的源泉绝不止原始图画一个，以上分析至少证明了符号亦为文字的源泉之一。

四、余 论

本文以上几节所论，实际上是以较为有限的材料和较为简捷的方法，证实了文字的源泉绝不是单一的。由于印第安文字使用离今天的绝对时差较短，而且海外还有较多的印第安文字资料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广泛搜集与深入研究，解决更多文字史和文字学上的难题。

另外，我们在第三节的讨论中，较多地使用了世界各民族古文字的比较与综合的手段。由于世界上存在的文字多种多样，它们虽不同也不记录同一种语言，但很可能各自代表着文字史上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文字的共性。如果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对它们的各自特性加以比较，无疑地会大大有利于对世界文字史尤其是文字发生史和早期文字发展史的构拟。

除此之外，本文的讨论还给我们一个启发：北美洲的一些印第安绘画，一般美国学者均称之为“印第安绘画”，但是它们往往又带有若干绘画不应具有的特征，其中包括上文论及的抽象符号、连结符号等等。对于这些文物的性质确定和类型划分，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结果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

汉字发生研究目的论

若是我们向古往今来即便都是现代的汉字学者尤其是对汉字发生问题进行过专文论述的汉字学者进行发卷调查，以征求“什么是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的答案的话，我们毫不怀疑，收到的答案会不很一致甚至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我们在此为这些虚拟的学者们草拟几份可能的答卷：

- A：了解汉字发生的时间。
- B：了解汉字发生的地点。
- C：了解汉字从何而发生。
- D：了解汉字因何而发生。
- E：了解汉字是何人所造。
- F：了解汉字如何发生。

以上6个答案，正应了 when、where、what、why、who 和 how 这历史科学的6个w的分析。

当然还有：

- G：了解祖国与汉民族文明历史之悠久。

显然，G所答是一个间接的目的，并不与我们要研究的题意相符合。

那么，在上面的A、B、C、D、E和F中，究竟何者是最合理的答案？

其实，肯定会有一些学者在其答案中包罗了A、B、C、D、E、F或包含了A、B、C、D、E、F中的某几项。

因此，这答案应该说是比较完整了，至少是在理论上。

然而，问题在于：看看过去的学者们的研究，又有谁真的回答了以上6方面的问题或对以上6方面的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

回顾以往的汉字发生研究，学者们确乎力图在以上6方面找寻答案，然而寻得的答案往往并不包罗以上这6个方面。

就以郭沫若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①为例。该文的主要部分确乎包含了 when（时间）（讨论了半坡陶符的C14同位素测得的时间至今有六千年之久）、where（地点）（在西安半坡）和 what（什

^① 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奴隶制时代》，244-27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么)(讨论了最早的是什么样的),但是并未对 why(为什么)和 who(谁即是造字者)以及 how(如何发生)的问题提出答案。我们不能说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由于未对 6 个 w 作出讨论就是无意义的,甚至不能说它不完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于汉字发生的研究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以前的专家未必能也未必曾在这种全面研究上做得很完美。

进一步说,若是一篇文章真正对上述的 6 个 w 进行了全面的研讨,也未必能认为它就是穷尽性地研究了汉字发生的所有方面。

先从纯理论或纯逻辑的角度来说明我们的思路。

应该说,任何一个小的课题,都有对它进行多次切分的可能性。拿汉字发生问题来说,上述的 6 个 w 的确是整个课题的第一次切分。然而,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进一步进行切分。比如,对于 what(什么样),可以理解为最原始的文字从何而来(from what),亦可以理解为最原始的文字怎么样(what)。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再切分,表面看来或是由于我们对 what 的理解不同,而且 what 本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实践上看,这 what 是可以再加切分的。

一种通常的认识认为,东方人的思想方法较重综合,而西方人的思想方法较重分析。尽管在文字发生的研究中西方人的分析方法并未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还是不幸地发现:至少在汉字的发生的研究中,东方人过于重视综合而相对地忽视分析的做法,确实是显现出来了的。

综观百年来的汉字发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般学者特别注意的是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一)汉字发生离今天有多久;(二)最早的汉字是哪一种符号系统。固然,这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但是严格说来:(一)这两点并不是全部的目的;(二)就这两点而言,亦可分别进一步切分。如汉字发生的时代可能有几个,因为未必只有一种原始汉字为汉字之源;既然字源未必只有一个,因此对所谓“最早的汉字”亦须一种一种分开来研究。

如果回到研究实践中来,那么从汉字发生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也确乎值得且必须重视重建汉字研究的目的。

从汉字发生的 what(什么)来看,至少这 what 可能意味着这么一些东西:指汉字的渊源物即汉字发生之前的东西是什么;指汉字原始的状态即汉字发生瞬间的东西是什么。另外,若换一个角度看,很可能这 what 是一个复合的东西。依郭沫若等不少学者之见,半坡和大汶口的文字分别为汉字之源,前者是指事字的源而后者是象形字之源,那么,汉字的来源至少有两个符号系统。再说开去,若是从文字作为符号系统的

特征来看，也可以认为这是对汉字的渊源物是何类事物（如结绳、契刻乃至八卦）的认识，那么，也许其渊源物也是多种事物的合成。

以上的讨论可以总结为：如果我们全方位地从理论角度去切分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那么，这目的可以进一步分析。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先前做得不够的。

从另一方面说，随着对汉字发生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还了解了更多的东西也属于或可以属于汉字发生研究的目的。于是，可以认为，研究的目的不仅可以从内部再切分，还可以从外部再增益。

比如，上面所述的关于汉字可能产生于异时异地的认识，即认为原始汉字的状况不止一种。

又比如，随着咱们对汉字发生的研究的进一步转化，我们逐渐发现，汉字的发生并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它至少包括准备阶段、发生阶段，而这发生阶段又不仅仅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随着这一认识的建立，我们就必须把汉字的发生过程作为一个历史作动态的描述。再进一步说，如果认为汉字发生的瞬间不易探知但可以通过早期汉字的状况来回溯，那么，对早期汉字的研究，也可以作为汉字发生研究的一个部分了。

再比如，对于汉字发生动因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深入的理解。传统的说法往往认为文字产生的充要条件就是奴隶制国家的产生。然而，用这一学说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的某些古代民族（如马亚）中文字产生于具某一性质社会而在另一些与之社会条件相似的古代民族中（如印加）却未产生文字。

这样的历史事实至少启发我们：社会历史条件并非是决定文字产生的唯一条件，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动因，需向多方面去寻觅。

还有，即便就分析而言，随着文字发生与汉字发生研究的进展，原先看似毋须分解的一些有关汉字发生的问题，也必须分析开来才能去做好。比如，关于书写工具与书写手法对于原始文字书体的影响，以前是一个汉字发生研究者几乎从不涉足的问题。然而，苏美尔文的研究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泥版烘焙工艺的开始，苏美尔文从其发生后的较早期就进入了笔画较简单的时代，楔形文字的发生正是这一广义书写工具与书写方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与之相应，我们亦应该去研究原始汉字的书写工具与书写方法对原始汉字书体的影响。

此外，某些在汉字发生研究中经过多次尝试而仍得不出仔细结论的题目，也促使我们把相关的题目研究得更细更深更透，非如此便无法解